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谈
与时代和生活水乳交融

写出人物与时代的勾连

石一枫

石一枫获奖作品为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

得知获奖的消息时，我正在漠河参加改革开放四十年采风，当然很高兴。《世间已无陈金芳》是我2014年写的中篇小说，写一个外乡女孩到北京闯荡的故事，我想通过这个女孩写出世事变化的感觉，有人说这是于连式的人物。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所处的时代出现了于连、拉斯蒂涅、盖茨比这样的文学人物，陈金芳是当今中国所处的时代出现的人物，是在中国经济爆炸、高度发展的时代出现的，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好像伸手就能抓住财富。我是想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写出时代的变化。我的创作观念比较传统，要写人物，写人物与时代的勾连关系。作家一是要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二是要体会自己想写的人物，我试图将这两者勾连起来。

（本文由杨鸥采访整理）

中华海洋儿女共同写就

许　晨

许晨获奖作品为报告文学《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

海风吹拂，海浪飞扬，我刚刚从西太平洋再一次体验深海科考返航，欣闻两年前写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心情就像这奔涌的浪花一样，十分激动和高兴。在此，我特向各位专家评委、责任编辑和广大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向作品中的主人公——为建设我们海洋强国而不懈奋战的海洋科学家和所有工作者，表示最诚挚最衷心的感谢！是他们不畏艰难、不惧风险，战风斗浪，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传奇事迹，给了作家用武之地，同时也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这个大奖首先是表彰他们，而我只是一个纪录者，一个时代精神的传播者。

从开始动议写作这个题材开始，整整4个年头我追随着中国人的国宝——“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也可谓是大半个太平洋……那还是2012年的7月，热爱海洋的我，辞去了《山东文学》杂志社社长的职务，作为引进人才来到美丽的青岛，受到了市委宣传部、文联、作协领导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提供了很大方便，专心在文联从事文学创作研究工作。这里浓郁的海滨风情、深厚的海洋文化深深吸引了我，特别是成功探海7000米、凯旋归来的“蛟龙”号停泊在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国家举行盛大的欢迎庆贺仪式和公众开放日。整个城市如同过节一样，沉浸在欢天喜地的快乐之中。

我是一名以深入火热生活、采访写作改革开放沧桑巨变为己任的报告文学作家，深知“蛟龙”号的横空出世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自这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克服种种困难，用手中的笔记录这件“深海利器”的来龙去脉，讴歌为其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科学家、试航员、组织领导者和船员水手们。于是，我开始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采访收集整理学习有关海洋知识、海洋文化的材料，了解掌握世界和中国载人潜水器发展的历程。同时联系国家海洋局、中国大洋协会安排我深入采访体验生活。2014年6月下旬，又是一个夏天，我登上了“向阳红09”科学考察船，前往太平洋海域参加“蛟龙”号“2014—2015年度试验性应用航次”的科考工作。

这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得到这样的机会与殊荣，我备感珍惜。历时近两个月，航程9200多海里，经历了台风大浪的考验。但，也使我真正品尝到了“蛟龙”团队的酸甜苦辣。在海上，在船上，我与潜航员、科学家和水手们朝夕相处，钻进“蛟龙”号舱内细致体验深海情景，取得了大量第一手鲜活丰富的素材，感同身受他们团结奋战打造“蛟龙”的心态和感情。如此，更坚定了我写好这部作品的信念。

写作中，正值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做重要讲话，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正是我采写“蛟龙”号所遵循的原则。作品中所写到的单位和主人公，诸如国家海洋局、中国大洋协会、国家深海基地、中船重工集团、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均积极支持配合，高度认可作家的劳作。应该说，这是一部中华海洋儿女共同写就的大书……

2015年7月，这部凝聚着众人心血的长篇报告文学终于完成了。而我的心还沉浸在那火热而深邃的“蛟龙”生活之中，时刻被作品中的人物和事迹感动着、激励着，心中的情感热流如同大海的波涛一样跌宕起伏。我的案头上放着一瓶泡在海水中的锰结核矿石，那是我在太平洋上得到的特殊礼品。写作累了，我抬头看一眼潜航员采自深海5000米的宝贝，身上立刻有了无穷的力量。

我知道，作品还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在下一步创作中继续努力，再谱新篇。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还不是一个海洋强国，海洋文学更需大力发展。生活就是一个海洋，越往深处畅游、挖掘，越可能发现“宝贝”。获奖对我来说，既是荣誉又是加油站，我将不负大家的厚望与关爱，继续深入到无边无际的生活海洋里，争取写出更多更好有关海洋的作品，为我国的海洋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竭尽绵薄！

整全地打量我们的世界

弋　舟

弋舟获奖作品为短篇小说《出警》

2016年，中国的丙申年，我起意写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就叫《丙申故事集》。

《出警》是这个集子中的第三篇，她首发在《人民文学》2016年的第7期。正如篇名所示，它事关警事，事关警察。结集后，朋友和读者都有反馈，觉得这个短篇和我在这一年里写下的其他小说都有些不同，我的责任编辑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她想知道，一个小说家在同一个时期，怎么能够写出截然不同的小说？

的确，一个作家的根本气质乃至在文学中处理世界的独特方式，总会有一个限定，而这篇《出警》，可能在朋友和读者的眼里，超出了作为小说家的我的限定。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必须做出说明，我承认，驱动着我的，首先是一个社会事件。写《出警》的时候，正有事关警察执法的事件耸动视听。我从不以新闻驱动写作的灵感。但是，我之所以在丙申年起意写一本小说集，并且用时间的概念来命名这本集子，正是因为我想要忠实地记录“现在进行时”。这首先是对于时间的忠实，是对身在时间之中的我看待世界时的态度的忠实。这样一个沸沸扬扬的事件，“即时性”地触动了我，我想要表达我对警察这个职业乃至人性的基本想象。于是，我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少有地来了一次“在场的虚构”。

“在场的虚构”，我认为自己摸到了文学之事另外的一个面向。如果说，写作亦如硬币，正反两面构成了它完整的形状，那么，更多的时候，我可能只热衷于摩挲硬币的单面，让那一面越来越亮，以至于遭到常年忽视的另一面，越来越暗沉无光。当我摸出这枚文学硬币来和世界交流时，它“截然不同”的光泽，没准会令人起疑，怀疑我递上来的，有可能是一枚假币。

是那个对于“忠实”的承诺鼓励了我。我写《丙申故事集》唯一的目标，就是“忠实”——忠实于自己既有的写作能力，忠实于自己“即时性”的思想感受，忠实于自己“此刻”的提笔热情。在这本集子的附录中，我和我的责任编辑做出了题为“重逢准确的事实”这个对话。其中，我们讨论最多的，便是“准确”与“事实”这样的写作伦理。

这就像同时捻动着硬币的两根手指，它们都是我的，你无法只认定其中的一根才是弋舟的手指，那样，不像是一个假动作吗？而捻动硬币这样的一个动作，唯有在两根手指共同的努力下，才能达成那种可被理解的、有效的动势。于是，在丙申年，由于一个社会事件的驱动，由于我对“忠实”所做出的承诺，我开始摩挲硬币的两面。

写作《出警》，我只是想要忠实地回到小说的伦理中，让每一个生命的实相去解释自身，让小说家的笔驱散那些“社会性”的纷纭的表象。我知道，唯有在这样的努力中，自己才能更加理解人之为人的本意，才能犹如摩挲硬币的两面一般，去整全地打量我们的世界。

如今，得到了鲁奖的褒奖。也许就此，我写作的姿势将更多地去尝试让两根手指共同地捻动，去磨亮硬币的两面。

感谢所有的评委，你们或许都不曾想到，你们激活了我的另一根指头。

目击成诗，脱口而出

张执浩

张执浩获奖作品为诗集《高原上的野花》

《高原上的野花》是我个人真正的诗歌精选集，选了我从1990年至2017年近30年的诗，以近3年为主。我近几年提出诗歌创作理念是“目击成诗，脱口而出”，这个理念在这本诗集中得到较好的呈现，强调对日常生活的即时反映，将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入诗。其次要找到有别于其他作者的独特语调。诗歌是一种声音的艺术，讲究词语间的咬合力，要把诗歌当作语言艺术来创作，不简单是思想的载体。诗歌要充满召唤的力量，把对诗歌陌生的人也召唤来，有亲和力。诗歌如清水洗尘，看上去轻松，其实与生活有水乳交融的联系。语言要准确，好的诗歌要有鲜活、准确的表达。如何在全球化、同质化的时代发出自己异质的声音，是我们迫在眉睫的工作。

中国新诗才百年，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我已年过半百，中国许多新诗诗人写到50岁就写不动了，而欧美的经典诗人越到晚年写作越成熟，如何延长自己的写作寿命，保持对生活的感受力，是我要努力的。

（本文由杨鸥采访整理）

本版许晨、张执浩、白烨、李修文素描像由罗雪村作

坚守文学批评四十年

白　烨

白烨获奖作品为文学理论评论集《文坛新观察》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时期学习写作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评论起，不知不觉间投身文学批评已40年有余。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得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我感受更多的不是欣喜，而是欣慰。

我为坚守文学批评四十年，有组织关爱，有同好关心而欣慰。

文学批评是个体的活计，寂寞的事业。从事文学批评，需要“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初心，更需要远离热闹，甘于寂寞的耐心。就我自己从事文学批评的体会而言，历经不同时期的风风雨雨依然置身于批评的队伍，挺身于批评的阵地，批评热情的持续葆有很重要，批评精神的顽强坚守更重要。我以为，我这次以《文坛新观察》一作收获鲁迅文学奖，重要的一点就是凭籍对于批评工作的坚持，对于批评精神的坚守。问题是，你自己这样去做了，也有人看到了，还给你点赞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自然令人备感欣慰。

我为文学批评在不同时期的奋力前行并取得不逊色于文学创作的成就而欣慰。

文学批评向来是文学事业中与文学创作双轮并行的一轮，并翼齐飞中的一翼。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自身日渐分化，文坛整体日见泛化，新型传媒日益强化，这使得文学批评既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与严峻的挑战，又常常被口水战之类的热点新闻不断遮蔽。正是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文学批评没有为之气馁，也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在审时度势中不断调整，在左冲右突中砥砺前行。在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文学倾向的分析与研判，文学创作的推介与批评，文学新人的发现与扶持等方面，都以多方面的努力，多样化的成果，为文学创作的持续活跃，文学事业的走向繁荣，做出了自己应有的重要贡献。这次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的获奖作品，便是理论批评家们在不断努力，理论批评领域在奋然前行的一个以点带面的例证。

我曾在《文坛新观察》一书的后记中，特别感谢了关切和支持这本书的编辑与出版的几位文友。在这里，我除了继续感谢他们之外，还要感谢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的评委们。我觉得，这种来自同行与同道的支持、鼓励与认可，能给人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人得到特别的激励。

和更多的人民在一起

李修文

李修文获奖作品为散文集《山河袈裟》

获奖当然很喜悦，毕竟得鲁迅文学奖是极高的行业认可。以我对鲁迅文学奖的了解，鲁迅文学奖近年来奖励了中国文学的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跻身其中感到很骄傲。一个作家的写作不是为了获奖，写作目的是为了对这个世界进行与作家气质更匹配的表达，奖励毕竟是个意外，不能当日子过，我想还是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写作。

《山河袈裟》这本书的名字和鲁迅有关。我以前是写小说的，有很多年写不出东西来，就以写剧本谋生，跟着剧组走南闯北，这本书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像自救一样下意识地写出来的，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人，碰到什么事，一开始是凭直觉写，写着写着就萌发了一种自觉：一定要写现在，一定要写此刻，就要写身边遭遇到的人和事。鲁迅有句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后来成了我写作的一个准则，鲁迅先生的作品是我写这本书过程中无穷的力量来源，这和获得鲁迅文学奖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联系。在我作为作家感到自身创造力无能和困乏的时候，这本书像奇迹一样出现，让我调整写作方向，恢复写作热情和信心，让我重新成为作家。以后在看得见的现在和未来我还要写两三本散文，和更多的人民在一起。我很喜欢“人民”这个词，“人民”就是我的同路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其实就是写我看见的这些人，搞清楚我到底是谁，为什么而写作，站在哪里写作，认清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美学。获奖让我更坚定地认为此前写作道路是正确的，我将继续抱着这样的信仰和纪律写作。对作家来说，纪律是非常重要的，越大、越严苛的纪律才能换来越大的写作自由。

（本文由杨鸥采访整理）